

机制，二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建立制度化的宗法秩序。当下年轻人的所谓“断亲”，其实质是核心家庭与部分旁系亲属关系的淡化，并非指向核心家庭内部，作为道德根据重要来源的“自然亲爱”的亲子情感本身并不在波及之列。旁系亲属关系的淡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作为儒学观念制度化产物的传统宗法制度的历史遗存所受到的现代冲击。就后者而言，“断亲”反映了五伦观念中朋友一伦地位的崛起，并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传统时代兄弟一伦的地位与作用，呈现出“兄弟友伦化”的趋势。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看，“断亲”现象并非意味着儒学价值的式微，而在于提示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内在调适。

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是时代趋势，“断亲”正是多种因素作用下社会转型的一个必然过程。这一过程未必意味着儒学价值的衰微，相反，恰恰可以提示我们去思考：儒学传统应当如何积极地进行内在调适，以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现代人应该如何从儒学传统中汲取资源，应对现代性带来的个体疏离、原子化生存等种种伦理、社会困境，让现代人的生活世界能够更多地保有人伦温情？历史上儒学曾多次应对时代变迁而调适自身，今天也同样如此。无论如何，只要人依然留恋“自然亲爱”的血脉亲情，依然渴望温情善意的人伦与人际关系，儒学的价值便始终有其内在的生命力。

*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理学政教意义问题研究”（编号：20ZXC007）的阶段成果。

从“断亲”现象看变动中的当代中国家庭伦理

赵刘洋

一、中国家庭伦理正在走向“个体化”吗？

若从社会科学研究严谨性而言，所谓的年轻人不爱走亲戚的“断亲”现象，似乎是一个难以进行精确分析的对象。这主要是因为，是否“断亲”更多带有个人主观选择的成分。正如涂尔干在关于“自杀”的经典研究中，他之所以运用大量统计数据来解释自杀，主要首先试图说明，纵然是自杀现象这种带有明显主观抉择的个体行为，其实亦可以作为社会事实进行分析。但是，“断亲”现象属于正在变动中的社会现象，更难进行大范围精确统计。所以从目前相关讨论来看，“断亲”一词更多是表达人们对变动中的中国社会的一种反应和焦虑：长期作为中国社会和文化主导性价值的家庭伦理，是否逐渐趋于“个体化”？

这里所谓的“个体化”其实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这一概念所描述的中国家庭正在从集体伦理转为更多强调个体权利和私人领域的趋向早就引起国际社会人类学学界的关注。比如，阎云翔受到贝克夫妇（Beck & Beck-Gernsheim）的“个体化”理论的启发，认为中国社会同样趋于“个体化”，中国社会“个体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个体的流动性不断增加，个体从家庭、团体和国家的长期干预中解放出来；其次，个体关于自我的身份认同逐步增强；最后，个人与社会出现新型互动关系，同时中国社会道德困境日益凸显。与此类似，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戴慧思（Deborah Davis）以中国婚姻领域的变化为例，认为中国婚姻日益呈现“私人领域化”状态，这种变化同样显示中国家庭关系逐渐趋向“个体化”。在她看来，中国婚姻“私人领域化”呈现诸多表现：法律关于离婚的障碍设置已降至最低，婚前财产约定获得合法性，夫妻共同财产主张已弱化，婚前性关系以及婚外性关系很少被惩罚，婚姻趋于自愿订立的合同关系，婚姻共同财产保护以及两性关系严密监控弱化等。对

戴慧思而言,国家逐渐从私人领域退出,婚姻家庭成为私人生活的重要内容,婚姻家庭关系的“去体制化”可被视为“父权制”文化的弱化,中国家庭关系从集体伦理向私人领域的转变实质上扩展了个体权利。^①上述这种认为中国家庭伦理趋于“个体化”的观点,显示的是一种普遍化、线性式的现代化思路,这种思路强调的是,国家和团体干预的弱化带来中国家庭伦理的“个体化”,而这种转变则意味着个体权利的进一步扩展。

从这种视角出发,很容易由中国年轻人越来越不爱走亲戚进一步得出中国亲情伦理意识逐渐解体的结论。更有论者似乎隐含着将“断亲”视为一种社会问题的预设,甚至由此而焦虑不安,好像必须找到根治“断亲”的方法才能重建中国家庭伦理。在笔者看来,这种焦虑大可不必。

尽管尚未看到扎实且全面的统计数据,但从目前的相关研究和媒体讨论中仍然可以看到,“断亲”现象折射出的与其说是家庭伦理趋向“个体化”,倒不如说是核心家庭在中国人的情感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这种变化主要和社会秩序变动紧密相关。

首先,大规模的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深刻挑战了传统的聚居式伦理社会。对大多数年轻群体而言,平时和亲戚交往就很少,感情意识自然淡薄,既然平时走动就少,又何必非在短暂假期通过所谓的“走亲访友”建立关系呢?更何况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曾经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伦理社会早就成为许多人心中的回忆和情怀。如今,天南海北、各居一方的情形已成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常态。姑且不论所谓的“断亲”现象,就是近年来决策层和学者们关注的留守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群体的心理和社会保障问题,也已经深刻表明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带来了中国社会诸多新的复杂变化。

其次,市场化的不断扩展同样深刻挑战了伦理社会中的亲情原则。“走亲访友”意味着亲友之间是基于亲情伦理原则进行交往,但是,近年来姑且不论所谓亲友关系,哪怕是父母或兄弟姐妹之间,因为房产继承、债务关系等“对簿公堂”甚至大打出手的案例和报道早就层出不穷。所以,对于一些年轻群体而言,既然矛盾都是在交往中产生的,那么不惹麻烦的便捷之道或许就是减少交往,尤其避免发生金钱债务关系。

最后,“断亲”不是意味着家庭伦理的解体,恰恰相反,它说明核心家庭在年轻群体的精神生活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对那些长年处于繁忙工作状态的“年轻打工族”而言,和父母团聚本身就意味着难得的放松,短暂假期自然难以再去“走亲访友”。对一般人而言,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显然不是一般亲族关系所能取代的。

所以,“断亲”现象折射出的是当代中国新的家庭伦理关系正在生成,而这种新的家庭关系既不是家庭伦理的解体,也不是简单的个体意识崛起,而是家庭伦理和个体权利的复杂纠葛,至于未来朝向何方,仍属未知。由“断亲”现象可以看到,城市化和市场化的深入扩展,深刻冲击着曾经的伦理社会和集体伦理。同时,个体在这种变动中的社会秩序中,无论在经济能力上还是情感上反倒更加依赖核心家庭,和父母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所以,当代中国变动中的家庭伦理未尝不可视为另一种形式的“回到祖荫下”。

二、个体与家庭的纠葛：变动中的当代中国家庭伦理

在笔者看来,当代中国变动中的家庭秩序的主要特征就是个人权利意识和家庭伦理之间的复杂纠

^① 对“个体化”思路的全面评析和讨论,参见赵刘洋:《中国婚姻“私人领域化”?——当代中国法律实践中的妇女离婚》,《开放时代》2019年第2期。

葛。对此，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11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所引发的复杂影响。这一解释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这一条解释在征求意见时争议最多。因为从表面看来，这意味着个人主义原则对家庭伦理的全面挑战，婚姻家庭的集体伦理正在被个人主义原则所代替。^①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来思考，正如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发言人的回应所指出的，法律在血亲和姻亲原则上选择血亲原则。试想，如果房产分割还像曾经的司法惯例那样，即婚后房产夫妻双方共同分割，那么子女的短暂婚姻就会带走父母积攒大半辈子财产的一半，这对于父母而言，果真公正吗？

所以，当代中国的家庭伦理正在形成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年轻群体实质上更加依赖原来的家庭。比如，现在社会中一个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很难具有独自买房的财力，若是婚前购房，基本都是父母出资。这带来的影响就是，子女与父母之间，无论在财产关系还是情感关系上都要高于夫妻关系，考虑到婚姻预期比较低和保护父母的财产权利，法律在保护姻亲和血亲原则上明确选择的是后者。

至于这种新的家庭伦理和法律制度的变化又将对夫妻关系尤其是妇女权利产生何种深刻影响，或许又是一个复杂问题。一方面，女性在财产权方面的保障的确可能会变弱。按照通常的惯例是婚前男方买房但婚后双方按揭还贷，或者该房产是婚前男方父母购买，那么可能的情形是若干年后他们离婚，不管他们共同生活多少年，也不管女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付出多少劳动，离婚时房产判决很难会判给妇女，最多是以房产折价款的形式对妇女进行补偿。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家庭伦理和法律制度的变化，也可能会引发女性拥有独立房产的意识和比例进一步提高。曾经婚房主要由男性购买，而今正逐渐转变为夫妻双方共同购买或者由女性独立购买。

总之，当代中国变动中的家庭伦理和法律制度表面上看突出了夫妻个人主义原则，但在社会影响方面将进一步强化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家庭主义原则。

三、中国传统道德理念的创造性转换

若从长时段视野来看，中国家庭伦理中个体和家庭的复杂纠葛也正是近代中国秩序变迁的核心问题：个体权利如何处理与道德伦理的关系，才能构筑一种理想秩序？

对中国传统道德理念的现代命运的分析，往往从既定理念出发，要么基于现代主义理念将道德伦理和个人权利对立，要么希望将道德伦理构建为超越现实世界的道德形而上学，两种理念尽管存在诸多对立，但具有相同预设：两者皆认为这套源自传统的道德理念和现代世界并不相符。然而回到实践就会发现，中国社会道德理念从未解体，它在变动的现代世界中不断进行创造性转换。

对此，著名历史学家黄宗智曾以总体性“正义体系”概念概括具有深厚历史延续性的中国制度类型，这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带来一种新的重要视角。这种启发在于，应该认识到中国“正义体系”本身即是道德和实用紧密抱合的矛盾体：一方面，源自中国传统的道德理念构筑并指引一个理想世界；另一方面，这种道德理念本身要适应现实复杂环境。这种既矛盾又紧密统一的体系所展示的思维

^① 赵晓力：《中国家庭资本主义化的号角》，《文化纵横》2011年第1期；强世功：《司法能动下的中国家庭——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谈起》，《文化纵横》2011年第1期。

方式被黄宗智概括为“实用道德主义”。^①而这套紧密连接道德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正义体系”在实践中具有强韧的延续性，并与近代以来引进的西方法律在碰撞中逐渐融合形成一种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现代制度体系。

因此，中国“正义体系”在现代世界并不必然与个体权利对立，源自传统的中国道德理念与现代法律制度在实践中的紧密结合呈现出一种新的现代性。比如在法律体系中，无论是调解制度，还是赡养双亲方面对西方赡养法律的重新理解、财产继承和分割中家庭主义价值观的延续、对离婚的道德化理解等，都可以看到传统道德理念在制度实践层面的深刻影响。^②这种认识带给我们的重要启发是，中国“正义体系”包含的对弱势的关怀和家庭主义价值观与现代法治并不矛盾。

所以，深入分析中国制度体系中实质主义道德理念的重要意义，也将带来对中国现代法治构建中的“形式理性”趋向的深刻反思。影响深远的社会学大家马克斯·韦伯曾依据西方法律发展历史构建了一套“形式理性”的理想类型，“形式理性”类型以个人权利观念作为主导性理念，这种类型法律是高度形式逻辑化且去道德化的。在韦伯看来，实质道德考量只会带来法律的非理性结果。从韦伯视角看待中国“正义体系”，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中国“正义体系”不重视个人权利保障，法律只是社会秩序控制的工具。^③但是，中国“正义体系”包含的道德理念在实践中会产生复杂影响，中国法律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主要以“形式理性”为目标——构建一种去价值化、去道德化、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法律类型。但是，由于部分群体在社会实际生活中仍处于弱势，当法律仅仅以个人权利和形式法治作为主导性观念时也会带来相应的问题，因为法律在排除权力干预的同时，若将实质正义一同排除，就可能造成部分弱势群体的境遇恶化。^④

总之，现代法律构建过程中不应忽略中国道德伦理的重要价值。构建一种既具有现代性又具有深厚的中国主体性的新型“正义体系”之所以可能，其基础在于，中国道德理念与西方权利观念具有相通性，两者的关键都在于尊重每一个个体的人格尊严，因为这种源自中国传统的道德理念在经历现代革命的浴火淬炼后已然实现重生。

“代变”：透视乡村“断亲”现象

桂 华

“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学概念，从“代”中衍生出来的概念还包括“代际”“世代”“代沟”等。每一个时代都具有特定的结构，这些结构性力量塑造了个体性质，汇聚起来就形成了“代”。当社会处于快速变化时期，主导社会的结构性力量转变得特别快，代与代之间的差别就会变得特别大，“代沟”就会出现，代际冲突也会更加明显。而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社会中，代与代之间更多是基于时间流逝所产生的自然更替，代与代的更替体现的是“再生产”，而非结构性替代。

当下的中国正处于快速变迁的过程中，这在人群上就反映为群体的分化和代际的分化。当下，媒

① 黄宗智：《中国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开放时代》2008年第4期。

② 黄宗智：《道德与法律：中国的过去与现在》，《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黄宗智：《中国的现代家庭：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的视角》，《开放时代》2011年第5期。

③ 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6—159页。

④ 从这一角度与韦伯理论的对话，参见赵刘洋：《妇女、家庭与法律实践：清代以来的法律社会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Summaries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Logic of the “Two Integr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YAO Zhongqiu

Abstract: Regarding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President Xi Jinping summarized the method of the “Two Integrations” and highlighted the significant significance of the “Second Integration”. This important political judgment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method of academic research, so as to investigate the proces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which can be found obviously cyclical and staged. During the two periods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naturally forms two cycles, each of which has gone through two stages: the former stage mainly carries out the “First Integration”, and the latter stage mainly carries out the “Second Integration”. The two stages have formed an obvious progressive and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and promote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achieve breakthrough development in ideology and politics. Revealing this law helps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contemporary connota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Key words: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world system; the “Two Integrations”

The Phenomenon of “Kinship Disconnection” from Traditional, Family,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GU Jianing ZHAO Liuyang GUI Hu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topic of “kinship disconnection” among young people has become a hot topic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Although there is no clear data statistics, it at least indicates that many young people are currently experiencing anxiety about “wanting to disconnect from kith and kin”. Society is like a giant machine. Facing the tremendous changes of the times,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re will be a process of movement, adjustment and adaptation, and even the phenomenon of “screws loosening or parts falling off”. Does “kinship disconnection” mean a disease of the times or adapting to updates? In order to better explain the phenomenon of “kinship disconnection” from an academic perspective,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New Horizons From Tianfu* planned this written discussion. Associate Professor Gu Jianing believes that the phenomenon of “kinship disconnection” does not mean the decline of Confucian values, but rather suggests the internal adjustment of Confucian tradition in modern society. “Kinship disconnection” reflects the rise of the status of friendship and shows a trend of “emphasizing friendship within brotherhood”. Associate Professor Zhao Liuyang believes that the phenomenon reflects the emergence of new family ethical relationships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presents the complex entanglement between family ethics and individual rights. China’s “justice system” is not necessarily opposed to individual rights, but presents a new modernity in practice. Professor Gui Hua believes that the phenomenon appears to be a rupture of kinship relationships on the surface, but in es-

sence, it is a change i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 reflection of the great changes of the times in intergenerational replacement. Through this phenomenon, the mechanism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rural construction can be explored.

Key words: “kinship disconnection”; written discussion; Confucian; family ethics;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Subject or User: Reexamination of the Essence of Digital Lab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YAN Jinqi

Abstract: “Digital labor” is one of the core categories of the era of digital capitalism. The concept of digital labor has been studied in political economy through the “structural study” and the “elemental study”, which focus on the digitisation of the subject of labor, thus reflec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user and the subject. The user is essentially a combination of the subject and the digital medium, and the digital medium is privately possessed under the capitalist system, therefore a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user in digital labor is formed. Based on this dynamic relationship, the “userisation of the subject” is highlighted as the core feature of the concept of digital labor, and its socio-historical connotation is demonstrated through three evolutionary paths that are simultaneously present, namely “the subject’s labor in a digitalized environment”, “subject’s digital activity is user’s digital labor” and “subject’s digital labor”. This way of interpretation allows the concept of digital labor to adapt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while having a clear core, thus possessing relatively stable vitality and criticality.

Key words: digital labor; platform economy;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digital capital

The “Debate Between Qi and Lu Schools” i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heory of Meng Wentong

FU Zheng

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recognized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at the master of the Shu studies, Meng Wentong, experienced “three changes” in his academic life: the first was the theory of “Three Systems of Ancient History”, the second was the Zhou–Qin Incident and the struggle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and the third was the new Confucianism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However, few people have noticed that there was always problem awareness of debate between Qi and Lu schools in Meng’s Confucianism theor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Qi and Lu schools w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Meng’s academic path and also the peak of his later research on classics. In his early years, Meng Wentong made research on the studies of Qi and Lu based on Liao Ping’s viewpoint of dividing the New Text Confucianism and Old Text Confucianism based on the system of etiquette and geography. He regarded Lu school as the authentic New Text Confucianism, and Qi school as a mixture of Legalism, Mohism, and Yin–Yang Studies. The urgent task was to “eliminate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Yin–Yang Studies, and use the system of etiquette as the standard for studying Confucianism”. However, in his later years, Meng Wentong possessed a historical movement view of the Zhou–Qin Incident, pointing out that Qi School mixed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but instead reflected that Confucianism was a constantly developing theory. Comparing the different views of Meng Wentong on the debate between Qi and Lu Schools in